

# 中山高

*Eastern Messiah*

郭俞平，中山高，2015

作品裝置含影片 5 分鐘，圖畫 12 張，雕塑裝置，及此冊子



## 戰爭之囚

學者 Bruce Cumings 的《朝鮮戰爭》（The Korean War）一書中，描述匈牙利作家提伯·米瑞於 1951 年抵達北朝鮮，目睹「鴨綠江到首都（平壤）之間完全毀滅」。「我們在夜色下開車，因此我的印象是我們像在月球旅行，因為只有一片瘡痍……每個城鎮都只剩下一堆煙囪。我不曉得為什麼房子垮了，煙囪卻沒垮，但是我經過一座二十萬居民的城鎮，只見到幾千個煙囪—其他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堆低低的，大塊紫色的灰燼」。

韓戰當時，美軍對北朝鮮進行了三年的地毯式轟炸，主要是汽油彈，甚至威脅要用核子和化學武器。這是對付日本和納粹德國的空中作戰進階版，只不過北朝鮮是個第三世界小國家，戰爭開始沒幾天，制空權就全落在美軍手裡。

一群差別不大的畫面湧來，勾起我一絲莫名的眷戀之感：那些窗框、牆垣、水泥柱，所有熟悉的街景被風暴捲起變得刺目而破碎，沒過多久，一座城市變成徒具形骸的廢墟而已。此時耳際間充滿包廂中的各式轟鳴，螢幕熠熠發著光，裏頭的斷肢殘骸纏混著對面觀眾凝神的氣息，很快地向遠方撲襲而去，然後不用過多久，一切又靜止

在那樣柔和的光源中，如獲新生。透過好萊塢科幻電影日新月異的特效，各式各樣的「世界末日」任君點選，一次比一次逼真。我不曾經歷過任何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卻對這些場景熟悉的要命。

再把時間往前倒一些，如今在網路上已極易取得的那張長崎原爆後的照片，拍攝者逆光看著太陽，不遠之處原本是一座教堂的地方唯獨留下一面牆，而四周滿目瘡痍。張承志在《敬重與惜別》的第二章〈長崎筆記〉這樣寫到：「1945年8月9日11時2分，即廣島變成地獄之後三天，美國 B29 轟炸機把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北部空中引爆」、「…據長崎史料說，與爆炸同時，生成了可說是小太陽的巨大火球，爆炸瞬間的溫度達四千度，一公里以外也達一千八百度。…玻璃瓶子被燒的軟如稀泥，人的肌膚被燒後噗嚕垂落，散彈般的玻璃碎片橫飛，長崎市街立陷火獄。」

翌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美國對日本實施軍事占領，這個在東亞現代化過程裡其中一個無法用單一封閉的國家視角去理解的歷史事件，也在某種程度上規定了戰後東亞的歷史軌跡。

戰後日本學界也對戰爭時日本原子彈研發的失敗有諸多反思，但並非圍繞原子彈研發本身之罪的道德問題，而是為何英美等民主國家能調動如此眾多的資源和科學家製造研發原子彈，然而帝國日本和納粹德國卻失敗了。實施軍事佔領不久以後，日本眾議院便提出了核能研發預算，並迅速地被通過。美國核能委員會曾於原爆後不久公開提議：「在廣島、長崎的記憶還歷歷在目之際，如果能夠在日本這樣的國家建設核電站，不但非常有助於使全體美國人擺脫對兩個城市施加殺傷的記憶，而且符合基督教精神」。1955年，日美便簽訂共同研發核能的合約，而核能在美、日的傳媒中被描述為和平的用途。丸山真男筆下的官兵中佐：「日本也要盡早造出好的炸彈！」一話迴盪在東京審判的法庭上空不絕於耳。

1959年，改編自澳洲小說家 Nevil Shute 原著的電影《On the Beach》在美國上映，故事設定在不久後的將來，描述核戰之後南方國家的倖存者們消極等待滅亡的故事。

## 場景二 那條路

一輛 TOYOTA 的藍色轎車疾駛在國道 1 號的玉田交流道，乘坐在車上的是再平凡不過的一家人，結束了周末採購，在車流還沒開始淤塞之前及早踏上歸程。那是一條平滑，充滿曝白強光，且特別工於某種無色無味、極簡線條的高速公路。

它又叫「中山高」，最早建成的路段是這座島嶼上的第一條高速公路——麥克阿瑟公路。1950 年韓戰爆發，為了防止戰線延伸，美國決議在政治上中立台灣，派出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並給予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讓退守台灣的 KMT 燃起一線生機。這條路是為了提升作戰需求，1962 年在美援的協助下開工，並以美國軍事將領 Douglas MacArthur 來命名。而 KMT 於台灣的政權在美援的協助下逐步進行土地改革、進口替代的經濟策略，在以美國為首的產業鏈中以代工的方式與全球市場結合。

於是這條路的身世與它建成的時代就此蓋棺定論，我可以在這個家庭公路電影的前傳章節蓋下一枚歷史唯物主義的冷戰戳印。是這樣嗎？

故事要重視細節，小說家說。

我出生於1986年，台灣在1987年解嚴，我無虞的童年是在台灣社會正逐漸開放的年代，經濟發展的濃彩壓蓋過其餘刺耳的聲響，使四周的一切都得到了闡釋。我後來才知道，那正好也是美、英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強勢國家以跨國金融體系來調控國際市場和國際關係，自由市場的概念被運用到世界各個角落，而消費生活則淋漓盡致地體現了自由的精隨。

我坐在後座，從車窗外映入眼簾的，似是一整片在滑走中的灰撲撲之城，像素不足般的混濁狀態，難以辨識細節，然而當光線從雲裡滲漏時，那一切的鐵皮樓房、銀白水塔、稜稜角角的鐵窗，又使線條顯得過於銳利……。所有因為效率與方便而設計的開窗角度、水泥陽台和磁磚色澤；所有為了討個生活而搭建的黃紅招牌、七彩霓虹燈……所有這些尋常而且旺盛的生活足跡，全部無法挽回那基地的所在，且不斷地滑移。

在車廂外持續流動的全幅景觀裡，忽然闖入某樣巨大的身影，那是一個聳立的宗教式莊嚴造景，光潔的不鏽鋼條以極為邏輯性的方式層層向上搭建，腰處以上伸展三對大小有序的翼肢，它站立在一根直徑起碼有五公尺的水泥柱上，筆直地插入那缺少水與植生覆蓋的河床。遠處也有好幾座相同模樣的東西，一連延伸到山嵐的雲霧盤旋處。

車子以110的時速前進著，不一會兒也把這些龐然大物拋諸於百哩之後，坐在後座另一扇窗邊的弟弟此刻早已酣然入睡，車廂內除了他低沉濕潤的鼻息以外就聽不見任何人聲，唯獨從音響中傳來的是巴洛克神劇大合唱——韓德爾的Messiah。父親從大學時代就著迷於古典音樂，還有被我的國中公民老師形容為“像雞在尖叫”的歌劇，起先我自以為聰明地判定這是他生命中一章充滿誇張華麗修辭的妄夢，但後來才發現，原來那聲音裏頭召喚他的是難以言喻的溫暖寧靜，或者說，是召喚了我。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要把前座的父親母親畫成宛若兩座石像，好似他們會一直維持這樣的姿勢，直到永遠。可能像是一種時間的逆錯，腦海裡被植入某個兒時受創的折磨經驗。

我從未在現實中以如此的角度俯視那熟悉的車廂空間，然而這個記憶卻是從這裡開始的。一輛家庭轎車奔馳在高速公路上，車裡頭非常地安靜，這空盪令人不知所措，在那個漫長的窒悶時刻，突然靜止畫面被後座角落的細微聲響給劃破——女孩張開了雙唇，聲調囁嚅地又似故作輕鬆一般，向前座的父母親聊起了學校住宿的生活，她戰戰兢兢地想要把氣氛炒熱，那種帶有強迫性的熱情背後，是遞出了她交心的幽微請求。然而她癡心期待的接觸交流完全付諸闕如，車廂內依究無聲，那股寂靜是如此的深沉，甚至壓迫鼓膜。

實際上鐘的指針才動了一下，女孩卻感覺彷彿已過了一座冰山得以完全融化的時間。母親開口說話了，她對父親說了一些關於停車費的芝麻瑣事，並詢問父親的意見，好像在這之前沒有聽到任何其他聲音一樣。瞬時間，這車廂裡的一切都凍結靜止，女孩覺得自己從世人的眼前徹底消失，一點一滴的沒入黑暗中。

事情發生的時候是不成形的，意義永遠無法正面理解，也許我只是送出了某個版本，將事件予以標記或符號化，使其得以重新建構與詮釋。而我不得已送出的是一個小康家庭自艾自憐式的童年創傷經驗，以此來認證自己的存在。而當我將其作為創作的素材時，那已涉及了如何再現，其意圖與其說是尋求安頓失落，更多的其實是將失落轉化為一種美學，其中的策略性早已勝過了真實性吧。

主體的建構與創傷經驗有時候是一場共謀，放在西化與民族化的關係來看，未嘗不是如此。意義永遠無法正面理解，創傷的出現不是在西方殖民者將船堅炮利深入喉嚨時的事件本身，而是事後的回憶與詮釋，後殖民主體性的出現奠定在對失落的國族與純淨故土的發明上——一個特定的哀悼版本。

故事要重視細節，小說家說。

## TOYOTA

TOYOTA 只是日本三井財團其龐大企業集團中的一個子公司，而江戶時代發跡的三井是日本近代財閥之首。日本在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獲得台灣殖民地，以及在 1904 年的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國家工商業隨戰爭期間而需求大增，也將日本推向產業革命時期，此時三井集團經營的項目和內容也逐步擴大。台灣從隸屬中國的一省變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便被納入日本的經濟圈成為其獨佔貿易的場所，三井不僅掌控了台灣糖業的命脈，也取得茶、樟腦、鴉片的專賣權。

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以反壟斷為名對三井等舊財閥實行了抑制政策並將其解散。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一改故轍，又逐步採取了扶持壟斷資本的政策，促使日本的財閥組織又重新組合起來，並在韓戰和越戰中扮演美軍重要的後援和軍火提供商。在冷戰期間，這些財團也拓展出耐久性消費產品的生產線，如收音機、電冰箱等家電以及汽車，回應戰後社會日益旺盛的需求。



### 場景三 東方的彌賽亞

A

這是一個困難的試煉，如果將「成為有用的人」這個潛台詞自我人生的這齣戲碼中徹底禁用、摘除，那曾經搬演「尋找我自己」的尖銳內心暴露，還有那些叛逆、忌妒、羞辱、無效的救贖的成長篇章，會如何像剪斷懸繩而潰散瓦解的舞台布景，而扮演我的演員，只能口吐出一地支離破碎的主詞、受詞、動詞、和形容詞？

每天我時不時地要確認自己仍是一顆在正確軌道上繞行的行星，而不是某個故障的太空艙，漫無目的漂浮在黑漆漆的宇宙。「持續地生產藝術品」，我想如今父母親是這樣來理解我的，最終還是具有「生產性」，但跟「藝術」的合成體，極有可能是他們為我在檔案中特別杜撰的新詞，好讓這個困擾已久的問題終於可以塵埃落定，無須終日惶惶，擔憂那女兒是否又要走偏了道路。

現下彷彿已平和融洽的親子關係，透過 LINE 這種通信軟體僅少失誤的運作著，軟體中琳琅滿目的貼圖堪稱 21 世紀重大的發明之一，拯救了這不諳溝通的一家人。父親在群組中說話時，會使我真正地相

信，那些可愛的動物貼圖所傳達的是不易將情感流於言表的他內心真正的感受，那就是活生生的對話本身，甚至比以往的都更加真實，父親確實就化成那隻清純可人的松鼠對著我微笑。

「加油！」、「堅持到最後就會成功！」母親在我故作哀憐的抱怨生活的各種困難時，總會以這種句子幫我做結，彷彿我正站在一場波濤洶湧的激烈戰線前端，而她從遠方為這個戰士送上無比的精神支持。那些不時地從家鄉寄來的各種補給品，總是愛意滿盈讓我深陷其中，我們好似達成了某種共識，要協力打造出一具可以從中榨取出更多有助於生產的強健軀體和心靈。

過去我與父母親衝突發生時，要不是像隻憤怒受傷的獸般咬牙切齒，就是淚眼盈眶的抽搐著，腦袋裡劇烈的轟鳴聲不斷像當機了一樣半天也理不出一句話來，或者失控地咆哮。那是語言匱乏的極端經驗，腦袋充血通紅，體內的血液黏稠至堵塞使心如火燒，最顫慄的是有時會感到胸腔好似有個洞，探不到底的很深很大的一個洞，幾乎可以把我的頭給放進去，它隨著呼吸收縮起伏，每吸口氣便劇烈發疼。

我曾設想如何以抽象的觀念分化母親那許多聽來胸有成竹卻執拗無比的觀點：也許我應該先否認她老掉牙的出發點，攻擊她保守的心態，批評她對世事的了解不深，或以反證削弱其語氣，指陳她所說的這一切無非偏見，不值得我反駁。但所有周全的計畫都在那偽裝成遮遮掩掩地耳語卻又刻意洩漏的惡意中被徹底擊碎，「有害家族的品質」，她說。

如今我有幸地成為更進化的物種，對於如何扮演好自己早已感到駕輕就熟，有時連我都搞不清楚，到底那一句話是流露真情，哪一句話是故作姿態，如此對情感的細膩調度，不啻是為了謹慎防範那為我自己丈量而建的意志，會一不小心就鬆塌模糊，預防憂鬱沉默的沮喪，再次吞沒我。

竭力地調動自己至奄奄一息，這就是我所願意和選擇的。

## B

自 1890 年代起，鴉片戰爭和燒毀圓明園就被當作西方人加諸中國的奇恥大辱，長留中國人心中。而日本鑑於十九世紀遭西方列強欺凌，且凜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粗暴對待，開始展開浩大的內部現代化工程：廢除半封建的幕府將軍體制，代之以立憲君主制和統一的民族國家，創立了高生產與高消費的西式經濟體。

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後，好像使得一個關於白人的神話隱隱搖動著，證明亞洲的國家能找到自己通往現代文明之路的方式，鼓舞了當時仍受到殖民者荼毒的中國、印度、土耳其、埃及……。在此之後，數千中國人前往日本取經，造就出當時最大的集體留學潮。孫中山那時在東京而不是其他的地方，成立了同盟會，開始結交日本右翼志士，並四處遊說日本帝國資本家資助他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海外救國人生。孫中山在得知日本打敗俄國時大喜歡呼的情節，一直被日本津津樂道。

中國 20 世紀初的數年間，同盟會與國粹派史家積極地編寫中國作為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論述，試圖恢復與漢、唐和明代的聯繫，在當時已逐漸消失的儒家正統學說中尋求民族歷史根源的真實性，他們將民族的危機和文化的危機等同，且視之為使中國陷入列強欺凌的根源，從中引申出反滿、反帝的暴力革命路線。1911 年滿清帝國被推翻。孫中山後來在 1924 年赴日本演講時說：「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於現今便大不相同，以為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的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為亞洲一定不能抵抗，一定不能脫離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

而日本爭霸沙俄，是為了擊敗歐美列強與白種優越的殖民主義，以及為了亞細亞各民族的解放——這一種言說，後來逐步完善為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聖戰、還有大東亞共榮圈等一套理論，支持後來日本軍國主義的一系列擴張行動。日俄戰爭後第五年，朝鮮被日本併吞，繼台灣之後日本奪得了它第二個殖民地。

1925年孫中山因肝癌病逝，他死後被奉為繼承中華民族道統的聖人，蔣中正在日後爭奪權力的過程中也高舉繼承孫中山思想的大旗。孫中山死後兩年，在中國建立的南京政權是在派系爭鬥和流血中誕生的，面對當時其他爭權的軍閥勢力，五院在倉促間成立，政治領導者宣示中國進入「訓政」時期，政府的藍圖是由孫中山在他在三民主義的演講和《建國大綱》中草擬的。他認為中國民眾仍未準備好負擔起自治的責任，所以在訓政時期由「革命黨」代表人民行使國家主權，以黨治國，而五院體系只是表面，所有的權力集中於國民政府主席一人之手，即使在1949年KMT撤遷台灣以後，依然保留了這個政權的基本特點。

